

doi: 10. 16104/j. issn. 1673-1883. 2023. 03. 006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 ——基于杜集镇 L 村实证调查

裴 胜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关键词:“五治融合”; 博弈; 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3-0036-08

Analysis of the Game Paradigm for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Governance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L Village in Duji Town

PEI She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1, China)

Abstract: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s. With the innovation in grassroot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 traditional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will upgrade into "fiv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including the governance with politics, autonomy, rule of law, ethnics and intellect, which will be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fiv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will be centered on politics, based on autonomy, assisted b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nd backed up by intellectual power.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five rules and integration" will be interwoven into the governance game field, and th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with the game theory requires that the rural governance is a scenario in which multiple participants act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ir mutual-dependent interests. In practic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into rural governance is a variable game phenomenon in decision-making governance, which will eventually reach an equilibrium state with a robust governance momentum, and eventually get out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under the new system of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five-governance integration"; game theory;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曾指出:“推进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1]这是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

中国特色基层方案,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夯实乡村治理根基。从2019年开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就启动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其中提到坚持“三治融合”的治理原则,将三治治理方式进行有效创新。但我们深知乡村治理在实践当中存在复杂、

收稿日期:2023-0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评估研究(21BDJ066)。

作者简介:裴胜(1997—),男,安徽铜陵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E-mail:PS199705@163.com。

系统层次混乱、治理结构多样等特征。“三治融合”逐渐也成为基层治理的研究热点范式,随着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合互动政策要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乡村地区将会出现新的治理困境,到底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有效解决这些治理难题,需要我们从理论和研究范式上进一步深化开拓。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制度优势,而数字技术发展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是社会变迁使得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够应对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里面人们当初使用的旧的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守住逐渐丧失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新的方法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向别种文化学习^[2]。如何让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高效化、精确化,将“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新方式。就目前部分地区实践来看,尝试“五治融合”模式可以给乡村治理注入新动力。通过梳理文献对比发现,对“三治融合”治理结构关注较多,对“五治融合”的讨论也受到学界关注,但尚未形成有效的论点。从“三治融合”的研究来看,产生了很多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在学界主体有“三治”融合论、“三治”互嵌论以及“三治”组合论。张文显等^[3]认为在治理过程中,自治是主体,法治和德治属于两翼辅助,关键是将法治德治围绕自治是有利于丰富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郁建兴^[4]认为“三治”是整体论,他们各有侧重点,次序具有优先,但同时需要发力交织前进,发挥结合的“乘数效应”。如何实现最好的组合治理,在国外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实现顺序,美国先自治再其他治理,德国、英国强调法治在先,对于德治等忽视^[5]。乡村社会的治理是为实现“最适合的善治”,通过对于“自治、法治、德治”按照不同强度进行组合,功能互补,治理方式多样,体系趋向稳定,实现“最适合的善治”^[6]。

综上所述,根据“三治融合”的相关理论研究 with 组合匹配关系进行分析比较,我们将通过沿袭“三治融合”的思路,进一步探讨在三治的基础上加入政治和智治这一视角形成的“五治融合”。探究“五治融合”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内在关系和运作规则,以博弈理论为基础进行探讨。博弈论又称为对策理论,主要研究互动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考虑当中,他人的考虑也许纳入自己的决策,依据所掌握的信息选择策略实施,实现风险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博弈理论

模式主要有“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囚徒困境博弈”等,被广泛应用到决策研究当中并且取得重要研究成果。通过治理博弈研究,基于案例分析对“五治融合”在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关系和运作逻辑进行探讨,总结L村乡村治理成功的相关经验,特别是“五治融合”在治理博弈策略视角下如何进行融合到乡村治理实践之中,以及探索实现乡村善治的路径意义。

二、治理博弈与五治融合内在解析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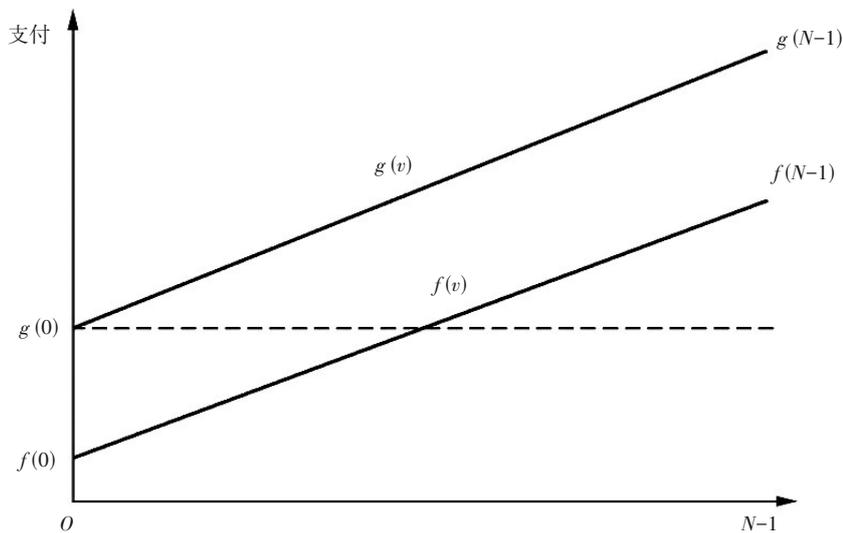
从“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来看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之间的关系。它们属于不同属性的治理方式,在治理使用过程中应对的目标是相互区别的,之间会存在相互完善促进状态,也会制约各自发展以及产生冲突。若想发挥五者之间的作用,应当把握好其中的融合变量。“五治”融合发展在于多方主体的参与,以构建在党建引领下充满活力的基层自治制度、规范有序的法治建设、和谐文明的德治及高效精准的智治。关于“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如果单纯地认为是简单数字化相加,那么将是不全面的。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相互融合、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付诸乡村振兴的治理实践。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五治讨论看来,主要认为政治是在于党建引领,自治是五治进行融合的基础,法治是刚性保障,德治是柔性导向,智治是技术支撑。对于如何进行“五治融合”治理效益最大化,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尚未进行细致研究分析。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传统的礼俗社会,乡土社会当中包含着大量的民俗、仪式、人情、习惯等。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将会制约着乡村的治理效能,运用“五治融合”的规则,就要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变量治理方式,不同属性的治理方式在乡村社会实行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博弈,博弈并非竞争,而是在实践中找到最佳的均衡点,取得最大的利益化。“博弈”(Game)是一种策略互动。法国博弈论专家克里斯汀·蒙特和丹尼尔·塞拉(Daniel 对博弈的定义:“博弈”这个词应理解为明智的、理性的个人或群体间冲突与合作的情形^[7]。博弈理论是策略互动理论,旨在关于策略相互作用,社会形势中理性行为的理论,其中每个局中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必须以他对其他局中人将如何反应的判断为基础^[8]。治理的博弈就是在个人或者团队组织在环境条件、规则制约下所获取的信息,经过一次或者多次在可选择的策

略下进行行动选择,且在过程当中获得预期结果。通过治理的博弈视角主要研究“五治”在融合过程中,不同属性治理方式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特征,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采取哪种策略会达到如何的效果,即决策的主体在采取决策后实现理性均衡的问题。

乡村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治理过程中决策主体采取何种策略将是一种博弈,决策不是真空出现的,要考虑到各方在乡村这个场景中如何行动带来最大利益。在博弈论当中非常著名的就是“囚徒困境”现象,在“囚徒困境”当中偏好结构会因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从而产生不合作。大卫·休谟认为集体规模越大就越难以达成合作。在

只有两个农夫共享一片土地的时候,合作为土地排水就不是问题,当这片土地有一千个农夫的时候,合作就变得困难起来。大团体与小团体的差异可以用合作和非合作博弈解释,在小团体之中,进行交流要比大的团体中容易得多,就像“五治融合”适合于乡村这个小团体当中进行融合治理,投放到社会当中执行起来将会面临很多问题和环境的复杂性。乡村治理应当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否则将会进入主体缺失、人才缺乏、道德弱化、数字鸿沟等多维度治理的“囚徒困境”。以“五治融合”推动的合作治理也许并未是最佳方案,我们应建立一个多元治理属性模型,其形成的融合支付成本会上升。



注: n =治理方式的数量, $f(v)$ =当采取多元属性治理方式进行有效融合的收获, $g(v)$ =当采取多元属性治理方式的时候其中一元方式未能有效融合的所得。

图1 多元属性治理方式的“囚徒困境”

以“五治融合”推动的合作治理也许并未不是最佳方案,但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多元治理属性模型来表示五治融合方式进行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如图1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 $g(v) > f(v)$ 时, v 取任何值,采取自治或自治+法治模式有效融合给村庄带来的融合支出成本大于效益带来的个人所得,由于单项或双项治理模式给乡村治理影响是不足以得到改变;当 $f(n-1) > g(0)$,即在治理过程中采取超过三治以上的模式,并且所有人采取合作态度进行参与,那么不仅使得村庄得以改变,而且每个人的所得超过三治融合所带来的好处,这种所得影响会在一定程度弥补乃至超过我们在治理过程中为融合支付的成本。简单来说, $g(v)$ 和 $f(v)$ 都是 v 的正线性函数关系,采取多元属性的治理方式越多,

多元融合越佳,那么给予乡村治理所带来的效益会越多,超出因治理产生的融合成本^[9]。其实“五治融合”的治理下的融合博弈反映的是奥尔森于1965年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本质^[9]。我们需要将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不同属性的治理方式根据村庄实际进行不同程度的融合多轮的治理融合博弈调整,那么适合该村的合作方案就有可能出现。若一直停留在三治或者四治的模式下,忽视其他的治理方式融入,从经济人角度出发,成本投入会越来越大,收益逐渐减小,将会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模式。治理的融合博弈虽然建立在博弈理论基础上去解释“五治融合”治理在现今乡村治理的必要性,源自经济学理论,但它显然有多学科的特征。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在本质上差别不

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同样要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只是政治理性人的体现形式不同,例如在进行乡村治理融合过程中,政治理性人的出发点是多元化,不仅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包括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其手段不以货币为主,而是运用“公共权力”^[10]。因此,提出从治理博弈视角去研究“五治”在不同乡村地区治理融合的情况,经济博弈的理性假设也适用于政治人。

三、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

目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五治融合”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乡村采取何种“五治”模式进行重新构建。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突破条块分割的体制束缚,统筹“五治”工作,以相对方便快捷、低成本融合博弈组合的方式搭建属于适合本村发展的数字治理平台,在此期间需要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复制,来实现“五治融合”的协同并进发展^[11]。通过安徽省乡村振兴局的项目合作调研进行驻村调研发现,L村在进行“五治融合”治理博弈存在相关实践难题。例如,政治方面基层党组织缺乏人才,组织队伍人员存在队伍结构与乡村治理实际供需不平衡,影响基层治理创新;自治方面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积极性不高,主体意识淡薄;法治方面尽管进行相关法治宣传,存在部分村民用不当的手段解决问题;德治方面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间,乡村道德价值规范易被侵蚀;智治方面技术赋能不全面,不仅数字技术投入不足,且技术平台优势尚未优化。L村将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借助乡村振兴政策驱动“五治融合”治理博弈效益最大化,来实现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要素运行良好、治理共识达成等。选取L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是该村在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具有特殊性,进行驻村调研发现,实现脱贫后本村在巩固脱贫成果上实现治理效能大幅提升,治理模式日趋成熟。二是该村在进行“五治融合”治理转型实践经验具有可借鉴性和推广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围绕经济产业发展为中心,联结利益群体,探索各个治理属性规则的融合博弈自治,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三是L村在“五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于是否选择以构建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德治、法治、智治为辅的互嵌模式,L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在融合治理过程中,快速寻找到适合本村发展的“五治融合”新体系,即以特色产业经济为核

心,党建引领利益联结巩固自治基础,法治为辅,德智共嵌。L村通过实现脱贫、巩固脱贫成果、迈向乡村振兴以及“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实践,丰富发展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为我们实现乡村基层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行的基层方案。

(二)研究方法

对于L村的“五治融合”治理转型个案分析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所运用的素材资料源自L村调研期间获得。调研期间,与调研人员一同在L村附近暂住,为期10天。本次驻村调研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观察法、集体访谈和个人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在访谈记录观察中,与乡镇驻村第一书记及组织部部长、乡镇司法所所长及民政所长、村委会副书记、村民小组长等进行座谈。在个人访谈当中,与当地离退休党员干部、老党员、有机蘑菇种养大户、其他村民等进行专题访谈。驻村调研后,通过资料整合,回访对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汇总。

四、L村“五治融合”乡村治理博弈实践机理

(一)L村“五治融合”治理博弈实践进阶

1. 政治:以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

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当中,领导治理的主体核心是党,并不是其他组织,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殊性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已经认识到其与一般意义的西方政党不同,并将其概括为“先锋队政党”或“使命型政党”^[1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是对党领导基层治理具体实现机制的高度肯定。从基层治理实践探索来看,除中央要求规定的“三治融合”之外,现在也强调通过“政治机制”和“智治机制”实现治理领导与治理新技术的引入,即“五治融合”。治理如同一场博弈,如何在博弈当中取得胜利,治理主体的领导者极其重要,党的领导从博弈理论视角出发,属于博弈决策者,采取合理的策略将会在行事场景当中获得利益最大化,乡村的治理博弈需要发挥“政治机制”最大化作用。

对此,L村在党的有效领导下,发挥政治机制优势,使得村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基层党建的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博弈的工作优势。具体表现为“三强化,一提升”:一强化领导核心,提升领导力。该组建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集体领导队伍,并在发展之初村集体就明确提出自主发展的路

径,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坚决扛住压力,抵制诱惑,不拿村民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做交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确保全体村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党的领导核心下,锻造配强“好班子”,积极发挥驻村工作队的作用。以及抓住党建“牛鼻子”,发挥“书记”的领头雁作用。L村将党建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牢牢抓住“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书记的模范带头作用。建立书记包点的园区管理机制,推行项目化管理,开展考核行动,强力推进园区相关党建工作,发挥“领头雁”效应推动党建促振兴。二强化组织载体,夯实发展基础。在村两委领导下,以村庄集体平台为载体,组建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为了盘活集体和群众闲置资产,把散、弱农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实施村集体资产由集体组织管理。采用“合作社+产业园+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杜集镇L村由党委领导村集体牵头,建立集合作社、产业园和松散农户的三方利益联结机制。三强化人才培养,提升发展质量。L村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通过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善吸引企业入驻,村两委工作人员积极为创业人才提供帮助,相关工作人员主动了解创业型人才的发展需求和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积极为创业人才提供政策扶持和创业补贴信息,鼓励、引导创业人才参与专业技能培训,逐渐全方位提升人才综合素质,为人才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政策服务环境。

2. 自治:以完善村民自治激发内生动力

201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对于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和“找回自治”一种肯定^[13]。L村在探索适合本村发展的自治道路过程中,以“乡政村治”模式为基底,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采取治理博弈进行自治。自治方面的治理博弈并非是动态博弈,设置对立面进行调整,而是在自治过程中调节存在缺陷的部分,使得行政村的自治单元运行效率提升。在博弈理论存在“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代表一定时期的模式,要求如果博弈阶段形成的战略组合,随意去改变都可能导致自身效用水平低下。“纳什均衡”是依赖于我们现实环境当中信息不对称、不完整的假设,自治的过程中也存在“纳什均衡”,通过自治模式探索创新,需要知道在融合的过程中,自治的结构、自治的规则和融合支付函数关系。因乡村治理过程中信息的复杂性,自治框架组合的“纳什均衡”是需要进行治理博弈达到自治决策的平衡。

L村的村民自治随着“一肩挑”政策推行,以党建为核心,党建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起来。自治单元主要从党组织领导力、村两委干部年轻化、专业技能支撑、村民参与意识四个维度出发。对于党组织领导力,抓党建工作,发挥“领头雁”效应推动党建促振兴。该村成立比较完善的理事会组织群体,大部分的成员是由党员构成,村党支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制度,扎实推进“四议两公开”工作机制,有利于村两委工作流程的规范性,事务推行的条理性。村两委干部对国家的政策起到的是“上传下达”的作用,负责管理村里公共事务,L村借助干部年轻化政策优势,自2021年L村换届选举后,村委干部为年轻人提供丰富的机会,吸纳年轻人才进驻本村,并逐渐探索出“老带新”+“传帮带”模式。干部的年龄结构呈现老中青相结合的特征,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对于政策解读、新知识学习能力突出,而老干部可以老带新帮助年轻干部如何融入本村与当地农户进行沟通。L村的专业技能支撑是依赖于来自本村的驻村工作队,该村目前迎来第八批驻村工作队,围绕着党建引领和科技下乡两大任务。如2022年,驻村工作队开展实用技术专题培训班8期,举办田间流动课堂20期,帮助L村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申报各级各类科技项目,培训农民人数达到240人次以上,发放标准化生产技术资料5000份,及时解决农民生产中需要解答的技术咨询。在农村地区,人们会在思想上保留着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认为村庄的治理是由基层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亟待提升。由于该行政村范围大,下辖20多个自然村,成立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构成自治单元。村民小组长日常传达村两委工作和宣传相关政策文件,带领村民参与村里事务。基于L村在自治方面治理,为了破除治理的“囚徒困境”,采取自治的最优战略组合,实现自治的“纳什均衡”。

3. 法治:以法治规范保障乡村秩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法治是要求通过法律的规则去约束规范主体行动,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社会秩序稳定,其中本质就是在乡村地区建立一套统一普适的规则之治^[14]。乡村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无讼”观念,熟人社会的流动性弱且同质性强,乡村治理秩序大多时候是靠内部权威维持,国家层面采取“送法下乡”强化中央权威^[15]。随着现代乡

村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基层法治建设推进,乡村地区民众对法治治理由过去的被动转化为主动寻求。在此情况下,农村地区依旧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弱场域,要想实现法治有效落地,法治的治理实施是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则要求法治的“纳什均衡”,任何单个人都应当积极参与到这项治理过程中。而在开展法治过程中要结合乡土特色,克服“水土不服”的现象,真正实现乡村法理社会。

作为民主法制示范村,L村大力加强对村干部、村民的法制宣传,在镇政府的组织和协调下,细化法治建设工作。建立针对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提升村干部的法治意识。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法治惠民工程推进,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宣传、协助村治理,打通法律服务在乡村地区“最后一公里”。此外,该村与镇司法所共同合作,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及矫正工作,家访、谈话、定期汇报、集中授课、组织社区服务活动等规范运行,切实做到周闻其声,月见其人,建立了“一人一档”“一人一矫正小组”“一人一矫正措施”的规范流程。另外,由于L村老年人口较多,且有部分老年人有被诈骗经历,村两委联合杜集镇司法所多次开展防诈骗宣传,通过印发防诈骗材料、大喇叭宣传、入户宣传等最大限度普及防诈骗知识,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为使法治文化深入人心,未来拟推进“法治文化一地一品”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普法工作站等基层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推进公共法治文化设施共建共享。

4. 德治:以道德示范构建乡村文明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采用德治即是运用道德规范使得文化氛围具有正能量^[16],德治更多的是从文化层面为治理提供支撑,挖掘宣传其中的文化价值是其核心要素。在过去历史时期,国家曾尝试在血缘关系浓厚的乡村地区,对待其传统道德进行集体主义改造,让农民去认同集体主义价值观。现如今,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再是传统单一的农耕经济,在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的冲击下,利益联结驱动合作文化及自我责任强化变得日益困难。德治的开展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出发,即在治理过程中,不以治理支付函数为主,治理的目标有先后之分,剔除不合理现象,达到德治治理效果精确且合理。

德治是乡村进行融合治理的有效辅助方式,往往与城市社区不同,乡村地区具有聚族而居、血缘亲疏远近交织的复杂性。因此,L村逐步探索出十星文明户、道德评议会、善行义举会等德治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倡导“以规立德”,制定《村规民约》,成立民约监督评议小组,引导并监督村规民约的执行和落实情况,村干部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同志引导带动村民相互监督、共同参与,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为丰富乡村乡贤模范带头作用,村两委设立红黑榜,在全村评选表彰“十星级文明户”,同时开展每周一次的道德评议会,对L村一些善行义举做出相对应的奖励和惩罚。与此同时,L村还对“十星级文明户”做出严格的筛查与监督,如评比前进行入户宣传、评比中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评比后在宣传栏进行公示等。为了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L村将评选结果与各项优惠政策全面挂钩。例如与“爱心超市”物品兑换、村评优评先等挂钩,让村民感受到星级评选活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为了推进德治治理的创新,利用线上微信加线下大喇叭的宣传形式,发动村民积极参与。根据调研统计,2018年以来,累计创建出善行义举榜102户,“十星级文明户”246户,推动L村形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德治局面。同时L村积极探索设立善行义举榜、村规民约等方式开展德育治村的新方式,并在村庄开展道德评议会设置红黑榜,让村民在“德”的培育中学会遵法守法,倡导人们做好事、做善事,讲道德、重品德,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时代新风,进一步丰富了L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5. 智治:以技术赋能提升治理精准

智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在“三治融合”基础上的补充与拓展,是为适应现代化与乡村社会的变革所需。随着乡村社会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着空心化、多元化、异质化凸显,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及时调整。智治的背后就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当中,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依托,将政治、自治、德治、法治当中“纳什均衡”易存在的不可确定的战略威胁剔除出去,使得治理方式“随机应变”,“向前看”且不固守成规。与此同时,让“赋权”与“赋能”紧密结合,采取平台优势、技术拓展和场域升级改造让乡村行动主体权利和治理能力提升。智治对于我们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符合数字乡村建设与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精准化的双向需求。

为实现从巩固脱贫成果转向村民共同富裕,从治理困难转向治理有效局面。L村深刻认识到智力支撑可以帮助本村更加准确把握未来发展动向,杜集镇L村与安徽大学签订了长丰县乡村振兴研究院L村分院共建协议,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采用“甲方出题,乙方解题”的方式开展多方面的课题研究、规划设计和建设合作,共建安徽大学长丰乡村

振兴研究院,充分发挥安徽大学学科优势、整合专家资源,打造高水平智库,为杜集镇特别是L村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L村乡村振兴产业园的成立融汇了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支持,如产业园中的蘑菇种植园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定期有农学教授对其进行指导栽培,农作物质量与产量均有所提高,L村的治理规划由安徽大学共同探索。目前L村正着力打造产业园配套服务平台,以期实现金融服务平台、商业服务平台、技术研发平台、教育培训平台相互协同,为产业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现代化支持。通过借助金融投资平台,由当地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共同打造社会化商业服务平台和信息平台,依托企业和当地高校力量设立研发平台和教育培训平台,提升产业园科技化、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化水平,为产业长期发展和整体产业提升提供持续支撑。

(二)L村“治理博弈”下的五治范式

乡村进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五治融合”治理的悬浮困境能够得到有效解决。L村通过“五治融合”治理方式,融合过程中不同治理方式进行博弈策略处理,选择策略的最佳组合模式,对此该村的五治模式是在不断治理博弈选择视角下形成。所谓治理博弈选择是指在采取治理决策时,即各种策略组合的模式是会相互影响行动方,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与策略适应性,进行不断调整。在进行策略博弈,调整的过程中进行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策略治理要依靠所掌握的实际信息,选择五治策略,以实现治理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治理下的博弈融合虽然看似比较简单,但需要决策方运用技巧和策略去付诸实践,由此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模型。

L村的“五治融合”治理探索出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形式即在治理博弈下对五治进行融合,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来实现治理博弈的“纳什均衡”状态,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首先,该村在政治方面,积极运用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工作机制转化,依靠党组织的凝聚力,统筹基层人、财、物等系列资源,强化提升基层治理合力。在自治方面实现村民自治的回归,自治应当包括自主性、自律性、自力性。村两委根据政策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两委班子,在“一肩挑”下实现组织领导力提升,吸纳新老干部群体,夯实组织载体。与此同时,通过自治下沉到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长传达村两委政策意

见,小组长带领各自小组村民参与村内事务治理。这对于行政范围较大的行政村进行自治是非常便捷且稳固,而且该村党员较为积极参与村内各项事务,与村两委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从脱贫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该村的自治水平不断提升,走向合作高效的自治模式。其次,在法治方面,该村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靠政策支持下成立的村法律援助工作室,定期援助律师坐班为村内群众解答,以及乡镇司法所联合公安相关部门开展“司法下乡”宣传工作,二靠村干部和村理事组织成员进行日常入户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2021年该村还获得“民主法治示范村”。德治方面,该村目前在村两委组织下开展“十星文明户”活动,通过宣传“善行义举榜”鼓励村民在村内多做好人好事。但本村目前老龄人口较多,未来德治将会进一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采取建设文化广场,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让村民在“德”的培育中学会遵法守法,倡导人们做好事、做善事,讲道德、重品德,弘扬社会正气。最后,L村在智治方面偏向于技术治理,主要依靠科技下乡与高校院所专家进行产学研合作,使得本村种养产业能够快速发展,带动村里群众致富。如果想要发挥智治的支撑作用,接下来由技术+数字治理将是未来新趋势。打造数字治理智能平台,将自治、德治、法治融合于其中,促进本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良性循环发展。

概括来说,治理博弈下的五治模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五治模式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治理通过博弈论的视角下根据治理支付函数反应来观察治理效益,根据实践证明并非每个村庄都适合五治融合治理,采取五治模式,各项治理规则在村庄设立的标准是不同的。而在治理的博弈下我们根据村庄自治、法治等情况将不同治理规则下沉到乡村治理各个方面,分别进行成本治理投入,从而使得五治治理具有针对性。第二,村庄治理组织呈现多样性,在治理的博弈下我们需要设立更多的组织协会来推动村庄治理,与此同时要坚持政治机制的作用,而靠单一的村两委组织平台是完全不够,根据各个治理规则成立治理单元组织是具有必要性。第三,村民参与“五治融合”治理的广泛性,在治理博弈下进行融合,策略的博弈调整会出现不同治理组织及协会,这些组织协会将会给村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村庄事务治理过程中。第四,治理博弈促进融合要求“五治融合”尽量以最低的协调成本为治理输出,通过治理规则融合治理模式,形成正确的集体行动逻辑。所谓的治理博弈并不是强调

自治的唯一性,也不是简单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的相互叠加,而是在治理过程中将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按照不同比重投放村庄建设过程中,使得村庄治理在不同场域的效率得以提升。治理博弈下的五治融合强调的是在参与村庄的治理过程中,进行多轮的治理规则博弈,那么适合本村发展的五治模式合作方案就会出现。

五、余论

通过实践证明由“三治融合”转向“五治融合”治理的模式未必能够适应所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但乡村社会的治理是如同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泛,利益交织复杂以及利益主体联结性弱^[17]。在乡村治理主体当中涉及多元主体,不仅仅是村民自治主体,还有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当发挥各自角色的作用,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但在治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治理问题还是会频繁出现,这其中并不是治理主体关系不够明确,究其原因在于各类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晰。尤其是在五治融合的治理基础上,我们形成的是治理的经验较多,从经验到规范亟待解决。事实上,治理策略是乡村治理运转的重要因素,各种治理主体是按照策略去实现自己的作用,将会直接影响到乡村治理的成效。因此,如前文所说若想摆脱乡村治理的“囚徒困境”,首要目标就是弄清不同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和着陆点。从整体上来看,我们是需要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一起付诸乡村治理当中,这种融合不是几种治理规则叠加起

来,而是在治理过程中采取“五治融合”同时,不同治理规则需要治理博弈。这种博弈并非某种策略占主导地位,替代其他策略,而是从博弈视角出发对治理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以所面临的一切治理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18]。以“五治融合”进行治理博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以自治为基础,法治和德治将根据本村目前老年群体较多的现状开创新的方式并以智治为技术支撑,将会以低成本的协调方式取得治理最大效能。在这个过程中,博弈的结果是五治关系,是在融合的基础上根据乡村实际情况进行相互补充,形成“一体共嵌”模式下的“五治融合”关系。

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兴则国家兴^[19]。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是密不可分,乡村的治理将会进一步影响治理能力的质量和整体水平。与此同时,实现乡村的善治是承载着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基于我国乡村政治和历史形态具有独特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参与自治积极性不高、法治意识淡薄、精神文明引领缺乏、数字技术治理不够成熟等系列挑战。我们需要从体制机制的创新形成经验,将经验进一步规范成体系付诸实践来展现我们乡村治理自信。诚然,对于“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行构建,通过治理博弈下融合的角度去研究,要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调整各项治理规则的边界融合,将先进的理念与地区经验相结合,根据其中的规律变化,走出一条符合顶层设计的意识且能够实现本地区振兴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骆苗,宫成秀.中国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模式与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113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8.
- [3] 张文显,徐勇,何显明,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J].治理研究,2018,34(6):5-16.
- [4] 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学术月刊,2018,50(12):64-74.
- [5] 杨开峰.桐乡“三治”实践的解读[J].党政视野,2016(7):7-9.
- [6] 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研究,2018(4):32-38.
- [7] 克里斯汀·蒙特,丹尼尔·塞拉.博弈论与经济学[M].张琦,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16-117
- [8] 黄涛.博弈论教程[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65
- [9] 斯坦因·U·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M].任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16-218.
- [10] 郭锐.博弈论视角下机动式巡察的反腐效力评估[J].天府新论,2021(3):99-110.
- [11] 王冠群,杜永康.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21(5):124-133.
- [12] 邓顺平.多治融合: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以J省P县为例[J].决策科学,2022(2):54-64.